

许倬云 著

我者与他者

中国历史上的内外分际



许倬云 著

我 者 与 他 者

历史上的内外分际



Copyright © 2010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著作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香港中文大学 2009

本书由香港中文大学拥有所有版权。
本版限在中国大陆发行。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者与他者：中国历史上的内外分际/许倬云著.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8
ISBN 978-7-108-03478-6

I. ①我… II. ①许… III. ①中国—历史—研究
IV. ①K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86251 号

责任编辑 张 荷 王 竞

封面设计 罗 洪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5.3

字 数 92 千字

印 数 00,001—10,000 册

定 价 19.00 元

江山风雨晦，长河万古流

迎第一届“余英时先生历史讲座”讲者许倬云教授

梁元生、黎明钊

—

2006年余英时教授荣获美国国会图书馆颁授的称号“诺贝尔人文奖”的“克鲁格奖”(John W. Kluge Prize)，消息传来，中外人文学者，拍手共庆，咸称实至名归。盖余英时教授为著名历史学家，学问渊博，著作等身，是当世华人学者之表表者。余教授毕业于新亚书院，后负笈美国，1962年取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先后任教于密歇根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及普林斯顿大学。1973年至1975年余教授回香港期间，曾任新亚书院校长及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之职。多年来一直担任历史系及中国文化研究所顾问委员，和中文大学关系密切。现今余教授是普林斯顿大学荣休教授。

新亚书院为表彰余英时校友的崇高成就，建议联同中文大学

另一成员书院崇基学院一起成立“余英时先生历史讲座”，推动中外历史文化，介绍学术新知。每年由两院合邀一位世界级著名历史学者来港，举行至少两场的公开讲座。

二

第一届“余英时先生历史讲座”的讲者，是许倬云教授。许倬云教授与余英时教授同龄，也同样是世界知名、著述丰富的历史学者。两人都是中央研究院院士，在美国教学及研究多年，而治学又同样包容中西、兼治古今，识见宏大，洞察深邃，分析细致，为同行所钦佩。尤其是两位学者除了有杰出的学术成就外，同样对于民族文化、家国情怀，都有莫大的深情和眷恋，处处流露在笔锋之间。单从《风雨江山》和《万古江河》这两部书的名字，便足以窥见许教授对中国土地和历史文化的用心。江山风雨如晦，历史长河奔流，余教授和许教授对学问追求，竭而不息；对文化视野，开拓远大；对民族生命，关怀备至，长抱忧思。第一届“余英时先生历史讲座”能够邀请到许倬云教授莅临演讲，真是最为适合不过的了。

三

许倬云教授，江苏无锡人，1930年出生于福建厦门鼓浪屿。中学就读于无锡辅仁中学，承袭了江南无锡“读书切实、做事认

真”的学风传统，致力研读同乡前辈钱宾四先生的名著《国史大纲》，私淑钱先生的学养方法，这对其日后的史学根基与治学态度有很大的影响。1953年及1956年，许教授先后毕业于台湾大学历史系及历史研究所，随即进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担任助理研究员。在台大就学期间，许教授从学于李宗侗、李济之、董作宾、劳贞一、凌纯声、芮逸夫及沈刚伯诸先生。在这些名师的教导下，奠定了深厚的治学基础。1962年他取得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台湾担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副研究员（1962 - 1967）、研究员（1967 - 1970），并任台湾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教授，曾任系主任及研究所所长（1962 - 1970）。1970年应邀赴美任匹兹堡大学历史系及社会学系教授，1983年荣任该校特聘之讲座教授（University Professor），1980年获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86年选为 Phil Beta Kappa 荣誉会员。1989年至1995年，荣任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其后又曾受聘为美国夏威夷大学、杜克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的讲座教授。

四

许倬云教授学问渊博，既博通中华五千年文化，及专精周秦汉三代之历史，同时又擅长应用社会科学理论研究历史。许教授的著作极为丰富，包括英文专著三本，中文专著三十多部，中英文

发表的论文过百篇。在他的自选集中¹，他说其著作可分成三类：

- 一、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
- 二、考古学；
- 三、讨论中国文化发展的文章。

他的三部专书：《先秦社会史论》(*Ancient China in Transition: An Analysis of Social Mobility, 722 - 222BC*)、《汉代农业》(*Han Agriculture: The Formation of Early Chinese Agrarian Economy, 206BC - AD220*)和《西周史》(*Western Chou Civilization*)，可以代表他在研究西周文明及秦汉政治、社会、经济等方面的成果。探索中华五千年文化的著作就更多，从《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质》到《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再到近年出版的《万古江河》，整个中国文化的开展与转折都能够在他的著作中勾勒出来。许教授说：“历史的演变未必有任何天定的规律，却仍有若干找寻的轨迹。”²这几部大作就是他追寻中国文化轨迹的重要成果。

周朝到两汉是许教授历史研究的核心。他探讨的课题围绕着政治结构、地方力量和农业经济。周是中国古典文明完成的时代，也是传统两千年文化的基础和泉源；汉是传统政治制度与社

¹ 许倬云：《自序》，《许倬云自选集》，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第1页。

² 许倬云：《序：中国史与世界史的若干省思》，《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2，第27页。

会结构形成的时期，两千年来政治社会的基本骨架在乎其中。所以这两个段落是了解中国历史基本性质最重要的环节。许教授曾说，他的研究范围牵涉到三个时期，一是形成期 (formation)，一是定型期 (crystalization)，一是转变期 (transformation)，前者见性格的发展方向，中者是特殊个性的定型，后者则为过渡的过程。这三个时期的研究，体现在许教授三种主要的专著中：《西周史》主要探讨以文化为概念之华夏民族的形成期；《先秦社会史论》则讨论古代世界过渡到普世国家 (universal state) 和普世文化 (universal culture) 的过程；《汉代农业》更进一步分析维持中国这个普世国家两千余年传统社会的经济基础结构。

五

许教授的历史论著主要探讨中国历史上两大课题：一是中央政府与地方社会力量的冲突和融合；二是农业与商业，亦即城市与乡村的互补与联系关系。而针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指出“亲缘团体”、“精耕细作”与“文官制度”为构成中国历史发展的三原色。关于第一原色，许教授认为中国异于两河流域的文明，他们以地缘结合人群，而周代则选择以血缘来结合人群，中国的政治团体、地方组织基本上是以亲缘的团体而扩展的。

“精耕细作”是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它与市场经济如车之两

轮，相辅并行。许教授认为中国农村并非遗世孤立、自给自足的经济体，而是坐落在更广大的市场网络的小环节；透过网络的接连，各环节互通声气。小网络结集于小镇，大网络则以城市为纲。大小环节既有生产与消费的关系，疏通的网络自然就产生物品与人力的调节作用。因此，商业未必是压迫农业的罪魁，城市也未必成其为剥削乡村的祸首。

许教授强调的另一个中国文化的基因特色是“文官制度”(bureaucracy)。中国的文官组织来源久远，完备而复杂的文官系统理论早在《韩非子》中就出现了。在长期的演变过程中，文官制度是国家与社会斗争中的制衡角色。中国的文官制度不仅是工具性的合理，而且有儒家意念掺和其中，这是韦伯(Max Weber)在讨论西欧自十六世纪以来的文官制度中所缺少的一环。儒家意念如果只当作意念系统，可能会成为教条，任何东西若变成教条就会神秘化，走上信仰的途径，而不走理性辩论的途径。儒家意念之作为目的而论，也可以相当基督教意念，是一种信仰，但儒家的意念却不是天的神谕，而是经世的使命。

六

有人说成家的学者都不愿把金针度与人。探析史料，是历史学者基本的训练。怎样把纷杂的史料爬梳，勾勒架构，条理不紊地铺

排出来却最容易难倒莘莘学子。许教授擅长运用西方社会学方法研究中国历史问题，他的成名作《先秦社会史论》就是应用社会流动的概念来辨析春秋战国的变革。他指点学子注重与检讨韦伯、S. N. Eisenstadt、William Skinner、Charles Tilly、Immanuel Wallerstein 等人的理论，这正是“金针度人”之举，而他本人的研究成果又不是生硬地用理论来演绎，而是以丰富的史料为基础，用严密的论证来分析问题，方法既一目了然，又融会理论，贯通百家，不着痕迹。

许教授积极推动应用不同学科的方法来研究人类文化的发展，考古学就是他学问的核心之一。他曾多次说古代史研究与考古学密不可分。在他和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前院长张忠培教授的大力推动之下，1997年、1999年和2003年，他们联袂主持了三次考古学会议。³ 前后与会的中青年学者逾百人，会议后还结集了三本论文集。⁴ 许教授积极推动考古学界中青年学者探讨人类历史

3 第一次是1997年，在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举办了“中国考古学研讨会——跨世纪的回顾与前瞻”。第二次是1999年，许教授促成了中文大学历史系与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省考古学会一起在北京西陵举办的考古学研讨会。第三次是2003年，继前两次会议，许教授又促成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举办“新世纪的考古学——文化、区位、生态的多元互动”讨论会。

4 许倬云、张忠培主编：《中国考古学的跨世纪反思》，香港：商务印书馆，1999；张忠培、许倬云主编，杨晶、黎明钊助理主编：《中国考古学跨世纪的回顾与前瞻：1999年西陵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许倬云、张忠培主编，杨晶助理主编：《新世纪的考古学：文化、区位、生态的多元互动》，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6。

的演化。由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中国考古学取得的丰硕成果，超越研探古器物与古文字研究的范围，建立了整套的层位学、类型学的研究方法。考古学家苏秉琦提出文化区系类型的理论和观念，进一步突破研究个别文化遗址的樊篱。中国文化分区的文化多元论，在中国广为学界接纳，许教授更进一步探讨区域文化之间的交流互动与分合。中国古代文化整合的过程，由聚落扩及当地中心 (local center)，进而迈向地区的中心 (regional center)，三者互相依存的层级关系，演化为复杂的政治体系。许教授在他的《另类考古学》一文中总结以空间为主题的地区研究说：

这一思考的方式，可以是演化的 (evolutionary)，也可以是传播的理论。其实，多线平行的演化论，即已容纳了传播的扩散效应，及相应而起的跃进效应。一个资源领域与另一资源领域相接触，经过交流而致融合，其间互相的影响，会改变演化阶段的发展的速度，及发展的方向。在一个领域的文化，与另一领域的文化相融合时，新的文化综合体，已不是原来任何一方的生活方式，而是另一生活方式。其中有若干领域的文化，会急剧转变，经由涵化程序，转变了发展方向。这一发展过程的复杂程度，与其当时情况的组织复杂性也有互应作用：越是复杂的系统，其系统平行的发展方式也

越有多样的可能，经历的过程也有越多的曲折。在人类历史之演化的程序，其实从未是直线的进行过程。人类的群体，不断在组成、接触、重组，于是社群与社区，都不过是长程演变中的一个阶段。地区性的考察，只是对于这些暂时出现的阶段，从空间与生态两方面，寻求其当时当地的情况而已。

他的研究并非止于区域，而是推及全球文化圈之间的交往，人类文化透过他曾说过的“接触→冲突→交流→适应→整合”五个延续阶段而不断演进。许教授是一位醉心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从他的著作目录中看到，以文化为题的书名就有《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等等。即使不以文化为题，我们以他的“历史分光镜”来解构，其实也是隐藏着以文化为研究核心的。

许教授在临近退休之年，曾经说过他有一个计划，就是要写一本中国文化史的大著。当时我们期待一位以历史学为本位，旁及社会学、政治学、考古学、人类学及生态学等辅助学科的学者，以宏观、广博的精神，通古今之变的视野，勾勒中国文化的开拓与转折。2005年，他的《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终于面世，这部书上通中国文化的黎明时期，下及亚洲多

元体系的中国，以至在世界体系的中国都涵盖贯通，最后一章中国的“百年蹒跚”尤令人感到唏嘘。读其书想见其人。精湛的见识，豪迈的笔触，处处流露深厚的感情，许教授是一位真正对中国历史文化有温情和敬意的学者。

本文部分内容参考自林聪标、刘石吉执笔的《迎许倬云教授到新亚书院讲学》，收入许倬云：《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2，第7 - 28页。

目 录

江山风雨晦，长河万古流	iii
引言	1
1 史前时代	5
2 殷商时代	9
3 周代封建的天下	11
4 战国时代的列国体制	23
5 中国世界的形成	33
6 汉代的中国	39
7 帝国系统的衰变	45
8 族群“主”与“客”的转化	51
9 “我”、“他”的大混合	57
10 唐代的中国	65

11	宋代：列国体制下的中国	73
12	蒙古的时代	85
13	明代中国	97
14	满清帝国	109
15	近代的变化	119
16	国共两党的中国	131
	后论	139
	补跋	141
	许倬云著作目录	153

引言

这一本小书是从一次讲演引发的。2007年11月，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与新亚书院合办、中大历史系协办“余英时先生历史讲座”的第一次讲演，我应邀担任讲者。第一讲里讨论中国地区，几个史前文化都在距今四千年时发生历史重大变化。第二讲是讨论中国历史上不同时代的“中—外”关系模式。这两次讲演相关，但并不处于同一深度。这本小书，则是由第二次讲演所涉及的项目，延伸其内容，补充了当时应予陈述而未曾有时间处理的观念。我可以只将原来讲演的录音稿修改润色，作为讲演记录。但是，那一小时的讲演，实在留下了许多应说而未说的漏洞，我自己觉得有责任补足缺失，庶几不致太过简略疏漏。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社长甘琦女士，更支持我干脆写书，以代替原来的讲演录音稿。学术工作本来即不应当因陋就简。于是，我决定在甘女士承诺的“一本小书”范围内，交代对于“中—外”关系的一些浅见。

所谓“中—外”关系，若从日常语言的含义看，当是一个国家或一个文化系统，在面临“他者”时“自—他”之间的互动。但是，中国的历史，不是一个主权国家的历史而已；中国文化系统也不是单一文化系统的观念足以涵盖。不论是作为政治性的共同体，抑或文化性的综合体，“中国”是不断变化的系统，不断发展的秩序。这一个出现于东亚的“中国”，有其自己发展与舒卷的过程，也因此不断有不同的“他者”界定其自身。另一方面，在商周以后，掌握文字记录及拥有丰厚资源的“中原”自认为中心，视周边各处为外地边陲。于是，这一“自—他”的相对地位，又具有“中心—边陲”的互动。“中心”不断因为扩张而改变其范围，于是“边陲”的所在，也不断有相应的变化。旧日的“边陲”，可能融入“中心”，而于周边，又有原本遥远的地区，成为新的“边陲”。同时，若因为有时由不同的地区掌握了权力与资源，“中心”的所在随之转移，则“边陲”的所在也会为之转移。又因“中国”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其地理空间由交通路线构成多重网络，干线所经，易于连接网络的中心；分支道路所经，即离核心隔了一层的“转接”，遂与干道所经之处疏远。遗留在道路网络之外的空隙之地，则又疏远了一层。上述“疏远”的意义，不在空间距离的远近，而在资源与信息的输送所至，决定其在网络上的位置，因此，网络上会有另一形式的“边陲”，离核心